

中国女兵档案

下

幽 燕 编著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女兵档案/幽燕编著. —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3

ISBN 7-80017-433-6

I. 中… II. 幽… III. 纪实文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37493 号

中国女兵档案

幽 燕 编著

*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阜外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邮编:100037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4 字数:60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017-433-6/E·100

定价:53.60 元(上、下)

内 容 简 介

一个女兵一台戏。

一个女兵一段历史。

一代又一代女兵的绿色风流和浪漫年华,是她们生命中最动人的乐章。

此书让我们一起打开女兵的历史档案,去了解女兵之花为何这样红,悟出女兵的闪光点 and 悲壮的音符,展示英雄的女兵之花在绿色军营中争奇斗艳……

王定国：女红军中的“定国公”

我国唐代有过一位被称为“定国公”的开国元勋，当代北京也有一位被称作“定国公”的老同志，她就是红军老战士，我党元老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她之所以被称作“定国公”，决不仅仅因为有个比较威风的名字，或是由于她是谢老的夫人，而是她本人确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前辈。三十年代初期她就参加了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故乡四川营山县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说来凑巧，当时谢老正是红都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不过他们那时还未相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还是一九三七年在兰州的事。现在我就从兰州起，讲这位“定国公”的故事。

一九八三年八月，坐落于兰州原南滩街五十四号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旧址院内，来了几位尊贵的客人，一位是当年兰州“八办”的处长伍修权同志，一位就是当年“八办”工作人员王定国。那时谢老是中共中央驻兰州代

表，伍、王二位都才二、三十岁，如今谢老早已辞世，他们也被人们尊称为“伍老”和“王老”了。当年的女八路，一进“八办”旧址正房，就拐向西侧一间小厢房，指着放了一张小桌和一张双人木床的北半间说：“哈，这就是谢老和我的‘家’，我们还是在这里结婚成家的呢！”

说起她与谢老的革命姻缘，还有一段佳话：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以后，王定国所在的四方面军总部有次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一天她见中央纵队一位长着小胡子的同志，拿着一包衣服朝自己走来，十分和蔼地说：“小同志，有件事情你帮帮忙，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中间絮上羊毛，过雪山草地时好当棉衣穿。”被称为小同志的王定国，马上接过衣包爽快地说：“要得，这还不容易，我马上就给你做。”第二天，她就做好送去了，还认真地说：“我的针线不好，不晓得行不行？”那位胡子同志却高兴地道：“哦，好得很。多谢你了，小同志！”说着又问了她的姓名，并且自我介绍道：“我叫谢觉哉。”王定国道：“哦，你就是我们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啊，我还当过你的部下呢！”有几位也长着胡子的同志，闻声上来凑趣，原来是董必武、徐特立和林伯渠等著名的中央四老。他们相互认识以后，谢老关切地问她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帮得如何了？

又介绍经验道：“你们可以找一些辣椒带着，上山冷时吃一点，提了精神又暖了身子。俗话说‘三个红辣椒，抵一件大棉袄，很管用呢！’她回去果然照办了，并且对教她这样做的谢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没想到两年以后，他们又在兰州重逢，不久就结为夫妻。

这是后话。

却说重访兰州“八办”的王定国，在那间引起无限回忆的小屋里，又指着同屋放着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的南半间道：“喏，这里是电台同志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就住在同一间屋里，中间只隔着一块旧布帘子。”她走到“八办”旧址陈列室里的一张放大照片前，仔细辨认着照片上的人，然后指着上面一个穿着旗袍的女青年道：“看，这就是我，身上这件时髦衣服还是别人借给我穿的呢！”原来当时为了便于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和当地名流打交道，王定国奉命把自己打扮起来，借了这件旗袍。

王定国和千万革命老战士一样，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苦劳动人民家庭，六岁就随父母下田劳动。全家干活却养不活自己，一个妹妹饿死了，父亲累死了，因为无钱安葬父亲，只得卖了一个弟弟，另一个弟弟为求生出门当了小兵，随后王定国自己也被押给一家姓李的做童养媳。不久，她的舅舅参加了我党组织的秘密农会，她马上被吸引跑出

李家，结果被捉回去捆了起来。她挣脱绳子又跑出来，还给自己放了正缠着的脚，决心跟着舅舅干革命。舅舅和地下党的同志只得卖了一头牛，将她从李家赎出，她才正式参加了革命。她很快就成为一名积极机敏的斗争骨干，先后在地方苏维埃担任内务委员、妇女部长和保卫局负责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一度当过专管抓捕处决反动家伙的保卫战士。她同反动统治者历来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关系，一提到某些国民党军政头目，她恨得直咬牙。可是到了兰州以后，谢老却让她协助自己做统战工作，并且专门去同国民党大官及其太太、小姐们打交道。

红军战士王定国，接受了这一新的战斗任务，虽然开始十分别扭，但却干得认真热情，不久就以她特有的诚朴豪爽，赢得了自己工作对象的尊重和敬爱。不少旧政府上层人物的夫人、小姐和女界名流，在她的影响和教育下，对促进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起了积极的作用，有的还成为我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例如当时的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很快与她结为知心好友。她遵照我党的意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组织了“甘肃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创办了《妇女旬刊》，团结了当地进步妇女，推动了抗日运动。倪斐君通过与谢老和王定国的接触，

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决心献身革命并要求加入我党，谢老请示中央后让王定国与她作了深谈，建议她暂留党外，以便作更多的工作。她听取了党和定国同志的意见，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履行了入党手续。除了这位倪斐君，王定国还与著名医生高金城的夫人牟玉光及女儿高雪洁、女婿刘亚哲等结为知己，使他们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谢老和她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尊重爱护一肝胆相照，不仅使许多党外朋友更加信任和热爱我党，还将谢老夫妇视为良师知友。在延安时，边区政府参议员李丹生先生临终前，特意将自己的孩子托给谢老和王定国代养。直到现在，定国一直是许多著名爱国人士如李铁铮、马璧等的好友。

王定国的善做统战工作，是从兰州开始的。她作为一个从未读过书的贫农女儿，开始掌握文化知识，也是从兰州开始的。当时她分管“八办”内的行政生活管理工作，吃苦她不怕，就是不会记账算账，她就拜谢老为师学开了文化，还找来算盘每天拨拉着。不久她不仅学会了读书写字的记账、算账，还向谢老学着写日记和诗文。

她学习学出了甜头和瘾头，后来调到延安，已经有了孩子，还进中央党校学习深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担任机要秘书和机关党支部的组织兼青

年委员。这时的王定国，已不只是一位年轻的女红军，而是一位有相当政治文化水平的党的干部和革命大姐了。但是有一点，工作和学习一紧张，她就把家给忘了。经常是孩子早饿了，妈妈却没回来，谢老只得当爹又当妈，用我国农村最原始的哺儿方法，自己先把小米饭嚼烂，再嘴对嘴地喂给孩子。孩子大了，就给块小米锅巴让他自己啃去。她的头几个孩子，就是这么带大的。她在兰州“八办”和延安时，是个称职的红色管家。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还获得这区机关劳动模范称号，毛泽东同志曾亲书“再接再厉”四字相赠。可在自己家里，她却是个大大咧咧的妈妈。

时过四十几个春秋，王定国又来到她度过青春岁月之地，自然有无限的感慨与忆念。但是王定国心里却始终记挂着另一件大事她迫切地要寻访几十年前留在当地的一大批红军战友。这里面有着我们党和红军的，也是王老个人的一面不堪回首的历史！

故事可以从她在长征途中初识谢老以后讲起。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胁迫原四方面军部队重过草地南返川康，使包括王定国在内的几万指战员，多吃了几倍的苦，直到一九三六年才会合红二方面军重新北上，于当年十月到达西北。但是没等他们放下背包，四方面军大部又奉命西渡黄河，向甘肃北部和

新疆进军，这就是后来的红国西路军。王定国当时是西路军总政治部前进剧团的服装道具股长和党小组长，团里所有幕布、汽灯和大乐器等等，都归她经管，还负责照管年龄较小的战友。他们进入河西走廊以后，部队一下陷入军阀马步芳和国民党追剿大军的重兵包围之中，红军因连续作战伤亡惨重，人地生疏又筹不到粮草，面临弹尽粮绝、饥寒交迫的困境。就在这样的险恶形势下，王定国和她的战友们，深入各作战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十二月初，他们来到永昌二十里铺的红九军驻地，一面进行慰问演出，一面掏空各人的口袋，凑了一点钱，买了几包烟和小日用品，分送给战士们，给那些一个连队只打剩几个人的指战员们，献上一点战友深情。

十二月五日，剧团的同志正赶往另一个部队时，与大批敌军遭遇了。他们马上撤到一个叫郭家大磨的庄院防守，用仅有的自卫武器和掩护他们的一个班，同团团围住庄院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敌人来势很猛，错把剧团同志当成了红九军军部，他们将错就错有意牵制住敌人，她掩护离此不远的九军军部转移。战友们守着又高又厚的土围墙抵抗敌人，王定国则把几个年小体弱的女战友领到圭炮楼顶层，捡拾残破瓦狠砸敌人，又组织他们趁开火时猛敲火油箱和各种响器，即造了声势，又激励了战友。打到下午，

敌人越围越多，我们却伤亡惨重，子弹也没了，最后敌人炸开了院门，王定国和战友们用断枪、木棒和砖瓦同敌人拼，结果被兵多势众的敌人一一逼到墙边，终因完全失去抵抗能力束手被擒。得逞的敌人见他们不少是女同志，还有着胡琴笛子等乐器，这才发现不是红军指挥部，气得大骂“上当了！”“打了半天，只是些唱戏的共产婆！”

恼羞成怒的敌人把被俘红军赶到羊圈里。有的同志衣服被剥光，只得捡张生羊皮裹着身子，一到夜里更冷得难以支持。机敏的王定国设法找到自己保管的幕布，一块块撕给同志们抵挡一下风寒，又拖来庄院的旧匾牌，让战友们烧火取暖。好容易捱过一夜，他们被押到武威，又见到了大批被俘同志。不久，原红军西路军除一小部分人突围去了新疆，其余大都伤亡、失散和被俘了！被俘同志中比较年轻体健的，不是被押去当劳工，就是强行编入补充营，伤残衰弱者则被大批地屠杀和活埋了。最遭罪的是一批女同志，有的马上被敌人军官拉去，有的被兽兵们拖去，更有的被当牲口似的卖了！军阀头子马步芳等得知抓到了红军的唱戏的，下令把这批人集中起来押到青海西宁他的司令部里，原封不动地编为一个剧团，派一个叫赵永鉴的中校参谋主任来监管，使王定国等同志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战俘生活。

马步芳和那姓赵的，管剧团的主要办法就是鞭打和虐待，王定国等同志则用种种方法同他们斗。敌人要剧团排练新节目演出，他们说没有编导人员，只会原来为红军演出的歌舞节目，敌人搞不出自己的东西，只得让他们将“红旗飘飘”等唱词改为“国旗飘飘”之类，命他们照常演出。结果，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公然在反动营垒里大演革命歌舞，并且照唱“红旗飘飘”等原词。有一次从南京来了个国民党大官，马步芳命令剧团来演出以示欢迎，演出中一个小同志在跳舞时，故意把脚上的鞋子踢到那大官面前的茶几上，吓得敌人以为女红军丢来了手榴弹，顿时全场大乱，弄得啼笑皆非。当然，事后大家都挨了那姓赵的一顿皮鞭，马步芳也加紧了对剧团的管制与迫害。有同志忍受不了，想同敌人拼了，王定国认为要慎重考虑，不能轻举妄动。

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同志不幸被俘。敌人只知道捉到了一个著名的红军女将，但因张琴秋于连续作战中流产过，又黄又瘦，衰弱得变了样，加上她故意蓬头垢面，自称是个四十多岁的烧饭婆，敌人一时未认出她来，只好让她在西宁一家羊毛厂做工。王定国等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定把张琴秋隐蔽到自己这里来，就找那姓赵的说，他们都是南方人，做不了北方饭，想把一个会做北方

饭的老妈了弄来帮帮忙，敌人没在意也就准许了。他们忙把张琴秋同志接来剧团，让她每天蹲在灶后干活。敌人一来她就在脸上抹把烟灰，使人更难辨认。可是以后由于别的原因，张琴秋和吴仲廉、陶万荣等几位女红军干部，还是被敌人发现了，被押去南京的，经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营救，她们才脱险归队。王定国和剧团一些同志，又被敌人押送到甘肃张掖敌军韩起功的司令部，在那里展开了新的斗争。

张掖一带是西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王定国到后，陆续见到不少因战败失散和被俘的红军同志，她悄悄地与他们进行了接触与联系，不久就与原红军干部刘德胜、武杰、邱均品和蔡文良等同志一起，在一个芦苇塘里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刘德胜为支部书记，王定国负责联络、寻找被俘和失散在这一带的战友。就在这时，中央委派谢觉哉等同志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的协定，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谢老找到著名的爱国医生高金城，请他利用与张掖敌军头子韩起功的老关系，在张掖开办了一所福音医院，并派来原四方面军的蔡光波同志，负责协助他查找、营救流散在当地的红军同志。秘密支部很快与他们接上头，高大夫就以慈善事业救治伤残为名，将流散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收进医院，又以增加护理人员为名，将王定国等要去医院，

开始了一系列营救活动。

王定国了解到张掖县监狱里正关着一批红军干部，正好张掖县长马鹤年对红军有一定好感，她便利用马县长提供的机会去探监找人，说是县长让她来找舅舅的。看守问她舅舅姓什么，她随口说姓李，正好原四方面军宣传部长刘瑞龙同志被俘后化名姓李，看守就把他叫了出来。王定国本来认识他，马上上前叫“舅舅”，刘瑞龙同志也心中有数，便利用机会迅速交流了情况，原来这里还关着魏传统、惠子明等几位红军干部，他们也已成立了秘密支部。王定国来后，正好与他们接上了头。接着高大夫又让王定国以护士名义，带着药品和营养品再次去探监，并让刘德胜也与刘瑞龙见面，秘密商定了斗争办法。高大夫还通过马县长适当改善了狱中同志的处境和生活条件，并将情况及时报告了兰州“八办”。后由我党中央出面，按照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向马步芳指名要人，敌人才不得不将刘瑞龙等同志一一放出，使他们经由兰州“八办”回到了延安。

秘密支部了解到附近的民乐县有不少红军的失散人员，便由高大夫派了两名医生，以巡诊为名跟王定国去民乐，探寻流落在那一带的红军同志。他们很快找到了一批，又通过他们传递了一百多张字条，上写“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是兰州南滩街五十四

号，有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让同志们分别设法去兰州“八办”归队。王定国又让去不了兰州的同志，就近去张掖找她，还交代了接头地点和暗号：到甘州福音堂后门，在门上连拍三下，她就会出来接应。她又给许多同志讲了当前的形势，传达了党的指示，特别是正在多方营救他们的措施，使许多陷入困境的同志重见了光明，并辗转回到了革命队伍。这些同志后来都为党作出了新的贡献，有的还成为高级领导干部，但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直接搭救自己出苦海的王定国。

秘密支部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支部决定刘德胜先转移出去，由邱均品和王定国等继续组织同敌人的斗争。敌人马上又察觉了王定国的活动，就在准备对她下毒手时，高金城大夫让她化装成一个修女，搭上一辆卡车直奔兰州进了“八办”，使她也脱险归了队。其余同志在高大夫的努力下，也一一陆续离开张掖回到了革命队伍。只是高大夫自己终于暴露了身份，于一九三八年阴历正月初四，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王定国一到“八办”就见到了谢老，谢老也认出了她。她向谢老汇报了张掖的情况，交上了从险境中带出的情报资料。组织上决定将王定国留在兰州“八办”工作，这样，她与谢老不仅是同志和长征战友，又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

她发现谢老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者，又是一位善示关心体贴同志的兄长和亲人，特别是他曾使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跳出了敌人的火坑，实际上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她对谢老的感情也产生了飞跃。谢老也十分喜爱这位活跃能干的“小王同志”。于是，他们就在同志们的支持下，在兰州“八办”那间简陋的小屋里，幸福地结为革命伴侣，为人们留下了佳话。

她到兰州“八办”以后，在谢老领导下继续营救原西路军的失散人员。有一次，她查访出有二千余名红军被俘人员，正被编为一个新兵团要调往内地。谢老立即通过中央和西安“八办”，将这一个团全部接回了根据地。

但是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已经找到并被救出的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仍有大批西路军战友一直流落在甘肃、青海等地。继续寻访、设法探望这批老同志，成了王定国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件心愿。直到一九八三年才约了原兰州“八办”的伍修权同志，重访故地探望亲人。她再次来到兰州后，马上就去河西走廊、青海西宁和甘南临夏等地，到处找战友，看故人。她每到一地就找有关部门查访询问，然后穿城入乡，四处奔波，终于找着了不少老同志老战友。在河西，她见到当年妇女团一位老同志，可对方已认不出她了，她动情地叫起了那位同志的小名，又反复报着自己

的名字说：“妹子，我特为找你、看你来了！”那同志这才记起这位当年一起长征共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正要哭着扑上来，却又连忙缩回身子道：“定国大姐，我有病，身上又脏……”大姐没答话，抢上前一把抱住了那位一身伤残病痛和浑身灰土痕迹的孤苦老人，热泪滚滚地说：“妹子，你受苦了，我来晚了，你骂大姐吧！……”两位老战友，说了伤心事，叙罢别后情，大姐要走了，悄悄掏出几十元人民币，又脱下身上的外衣一起塞给了老人，说只算给老人留个纪念，让她知道，党和老战友，一直还在记挂、想念她，人民不会忘了她！

一到西宁王定国就找到当年剧团的一位小战友。那位同志九岁当红军，十一岁参加长征，长征中边走还边为同志们唱歌喊口号，大家休息了，她又去跳舞慰问，在河西被俘时才十三岁。由于她年小活泼，深受战友喜爱，被大家叫做“小疙瘩”。王老见到她时，“小疙瘩”已经成了一位回族老大娘。原来她被俘以后先被迫当了军阀马步青家的使唤丫头，后又被赏给了一个营长，因为反抗被毒打一顿，强迫配给一个老马 为妻，幸好那马夫也是苦出身，十分同情爱护这个小“共产女子”，退伍时把她带回家，倒也安生过了几十年。现在，她丈夫已去世，儿女也成了家，日子还可以，就是一件事，想起就伤心。她对大姐说：“我